

A Study of English Retranslation of
Tao Yuanming's Poems in Light of Bakhtin's Poetics

巴赫金诗学视野中的
陶渊明诗歌英译
复调的翻译现实

蔡华·著

◆ 苏州大学出版社

巴赫金诗学视野中的陶渊明诗歌英译
——复调的翻译现实

**A Study of English Retranslation of
Tao Yuanming's Poems in Light of Bakhtin's Poetics**

蔡 华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赫金诗学视野中的陶渊明诗歌英译：复调的翻译现实 = A Study of English Retranslation of Tao Yuanming's Poems in Light of Bakhtin's Poetics/蔡华著.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 8
ISBN 978-7-81137-039-3

I. 巴… II. 蔡… III. 陶渊明(365~427)—诗歌—英语—翻译—研究 IV. I207.22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5045 号

巴赫金诗学视野中的陶渊明诗歌英译

——复调的翻译现实

A Study of English Retranslation of Tao
Yuanming's Poems in Light of Bakhtin's Poetics

蔡 华 著

责任编辑 汤定军 周建国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邮编：215021)

通州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印装

(地址：通州经济开发区朝霞路 180 号 邮编：226300)

开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31.75 字数 967 千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37-039-3 定价：50.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7258835

本书由 **大连市人民政府** 资助出版
大连大学

**The published book is sponsored by
the Dalian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Dalian University**

他 序

我在苏州大学已经招收了5届13名博士研究生,分别属于比较文学、典籍英译和英语词汇学三个方向。蔡华是典籍英译方向的第一个毕业生,她的毕业论文《巴赫金诗学视野中的陶渊明诗歌英译》得到了苏州大学优秀毕业论文的荣誉,现在她的博士论文在经过进一步加工整理之后即将以专著的形式出版,为她的专著写几句话是理所应该的事情。

对她的论文的意见和评述早在她的写作过程中已经多次提出,有一些意见在她的修改过程中已经吸取进去,有一些问题她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在这里就论文本身再评头论足似乎已经是多余的事情。我还有幸先睹了南开大学王宏印教授的序言,洋洋17000余言,见解精辟,我读后也深受教益,他在典籍翻译理论本土化方面的贡献是学界公认的。

我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是陶渊明,所以我也翻译了他的诗歌。在巴赫金诗学视野下,陶渊明诗歌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英译是一场狂欢的盛宴,与我国的“诗无达诂”乃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翻译是一种艺术,不同译者对同一诗作有不同的理解,然后经过不同的美学构思,创造出不同的艺术作品,使同一诗作的译文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分别突出了原有风采的不同亮点,使原诗像一道道美味的佳肴那样展现给译文的读者,构成一桌丰盛的宴席。经过翻译之后,陶渊明的诗歌获得了一次又一次新的生命。借用莎士比亚的诗句,“So long as me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 / So long lives this, 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把巴赫金的文学批评理论运用于翻译批评有助于拓展翻译批评这一新兴交叉学科视野,这是蔡华这一专著的主要贡献。

这里我想补充几句蔡华的学术经历。她在辽宁大学英语本科和在大连外国语学院英国语言文学研究生毕业后,从事英语教学多年,其中又有在国外学习的经历,这些为她从事博士阶段的学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她在博士生学习期间克服的阻力、障碍和困难恐怕只有她自己才体会得最为深刻。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水平有高低,但是最难能可贵的是具有克服阻力的毅力和决心,并取得应该属于自己的成功。她从苏州大学毕业后,在大连大学承担了新的教学任

务、争取到了新的研究课题,又有了新的目标,开始了新的奋斗,在中国典籍英译方面开始了新的探索。

中国典籍英译的实践和研究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我本人对此情有独钟。虽然是半途出家,我的第一部译著 1991 年我 49 岁的时候才出版,但我保持了一年一部的进度并且开始了理论研究和在学界大力推广。然而,纵然我仍然雄心勃勃,毕竟我已经迈向古稀之年,有着十年也干不完的计划,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所幸的是,我在苏州和大连的二十几名博士生和更多的硕士生,还有苏州大学翻译系的一批老师已经开始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他们在近两年之内有二十余部译著和专著已经或即将出版,蔡华的专著就是其中之一。再者,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对典籍英译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国家和各级政府也越来越重视这项工作。包括蔡华在内的六个人在今年三月下旬的五天之内完成了《话说清明》一书的翻译,并已在我国第一个清明假日之前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如期出版。看到这样一支充满活力的老中青相结合的队伍,我的喜悦之情是难以言表的。昨天我回到故乡苏州,看到水乡正在筹备明天开幕的国际旅游节,一艘艘盛装的龙舟正在准备巡游,想起明天就要到杭州看到西湖岸边一枝桃花一枝柳的快然春意,两天后又将看到武汉东湖的荡漾水波,一股喜悦之情怎能不油然而生呢?

是为序。

汪榕培

2008 年 4 月 17 日于苏州幽兰斋

他序

一语天然 常译常新

大连大学蔡华博士几次打来电话约我给她即将出版的专著写一篇序言。我对陶诗虽素无研究,但有一些兴趣,加之这本专论原来看过,与其导师汪榕培老师也很熟悉,于是就答应下来了。

据我所知,蔡华是汪榕培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生,也是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典籍翻译方向第一个毕业的博士生。现在,这篇研究陶渊明诗歌翻译的论文能以专著的形式出版,而且就在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在这本专著即将问世之际,能写一些话表示祝贺,也是一件很快慰的事,何况还可以借此机会表达一下我对于汪榕培先生一直怀有的敬意呢。

去年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典籍翻译第四届会议上,我见到了汪老师和蔡华,关于论文的选题和写作情况有过一次交谈;后来,在答辩以前送审的论文我也读了一遍。这里先把当时的审读意见概述一下,再加上新近的一些思考一起写出来,权做陶诗英译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一些相关问题的讨论吧。

一、从一篇博士论文的选题和写作谈起

首先,我认为蔡华的这个选题是很好的。她力图运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全面观照陶渊明诗歌的英译特别是复译情况,其理论切入和实际分析不错,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研究思路。这对于中国文化典籍的评论性研究在理论认识上有借鉴意义,对于认识和提高典籍翻译的质量和评价水平也有可借鉴之处。选题本身的品质和设计与完成的情况体现出导师的学术眼光和宽阔的研究胸襟。小而言之,可以说解决了一个具体的研究项目以至于影响一个博士生的学术生涯;大而言之,则可以说影响着我国目前的典籍翻译乃至一般文学翻译批评的理论导向。我是完全赞成的。

关于这一研究的初衷,蔡华在博士论文的第一章综述中有这样的论述:

本文拟用巴赫金诗学理论,适当辅助以筛选积淀重译论与翻译适应选择论,从拟订层面上对陶诗七种英译本展开比读,从而论证陶诗英译复译是多元互补、“和谐”创新的翻译现实。

文章以较大篇幅梳理和评述了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基本原理,尤其是力图以其复调理论和对话理论作为理论框架和分析概念,对照分析不同的陶诗英译本的时候,显示出扎实的文论功底和宏阔的学术视野。这一点从作者对于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诗学理论和翻译理论的评述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论文的主体部分对照分析了几个英译本,分别以时间、空间为界讨论了中国译者和外国译者的翻译特点,并在情、志、思三个方面考察了陶诗的复译情况。文章还从修辞和文化(文学、语境)误读等方面作了深入而细致的比读和分析,其中有的地方论述十分精彩,显示了一定的实证研究倾向所能取得的研究发现,给人较为明晰的印象。从参考的中外文文献和汉语写作的分量上不难看出作者研究的工作量和写作的学术分量。最后,从文章的理论观点与实证资料的吻合、各章内容和整个布局的平衡、准确的学术概念和清晰的逻辑推论等方面来看,这是一篇值得一读的博士论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运用自己导师汪榕培教授的译文进行分析和评论的时候,也能平等而公正地作出理性的评判。当然,一篇博士论文在短期内整理出版为学术专著,仍然有较大的修改和改进的余地。例如,在结论部分,如果能够就陶诗对比分析的具体研究结果作一整体的叙述,甚至结合最初的理论设计与最终完成的差距作一定的考察,或者在实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理论升华、超越与总结的可能性,那将会明显提高这篇论文的说服力,或者会增加这项研究和发现的分量。这使我想到了当前的翻译研究有关的一些理论问题以及和博士阶段研究的相关性问题,就从这些问题的讨论生发开去,扼要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

1. 首先,蔡华博士的论文和写作方式体现了一种很强的理论研究意识和理论研究倾向,这使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作为高深学问的研究和人才培养途径,在博士阶段的学术研究和博士论文的写作上,理论和理论研究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应当说,除了极个别轻视理论甚至主张取消理论的倾向以外,大多数人都赞同博士阶段的研究应当具有一定的理论意识和较强的理论研究能力,可是问题在于,理论在不同的研究类型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不同的理论与不同的研究类型的关系是复杂的,需要一定程度的认识才可以分辨清楚。例如,在纯理论的研究中,或者说在一些旨在建立理论体系的研究中或者以理论发现为主要目标的研究中,这种作为目标的理论自然处于核心的地位。在对以往的理论进行评析和批判的研究类型中,该理论则处于对象化的地位,而批评和分析一般需要另外一种理论作为分析概念或批评参照,即元理论(相对于作为对象的目标

理论而言)。应当说,忽视后一种理论至少是潜在地存在于研究者的头脑中,甚至对于何谓理论这样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没有一种抽象的、纯然的、概念性的掌握,此类所谓的“理论研究”就谈不上会有什么结果或品位。

2. 其次,在评论性研究和以文学翻译批评为主的博士论文选题中,是否需要理论和理论居于何等重要位置的问题,也是蔡华的选题所提出来的问题。一个基本的认识是:理论当然是需要的,而且是重要的,但所处的位置不同于上述的“纯”理论研究和理论批评型研究类型。在以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学翻译批评中,在面对一个文本或个案的时候,一种选择是可以寻找一种相关的理论,作为批评的概念和分析的工具;如果没有一种现成的理论直接可以运用,就要对已有的某种理论加以改造,让它适合具体的研究对象和批评的任务;有时也可以把几种不同的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作为分析或批评的概念、单位或工具,也就是说,制订出一个工作方案或操作程序。应当说,对于后一种研究而言,课题设计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设计出与特定任务要求相适宜的理论工具或概念来,或者制订出一套工作方案或计划来。有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以为文学翻译批评不需要任何理论概念就可以“直接”进行,这是不对的,最终会导致研究的肤泛或失败。还有的人认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批评与鉴赏中的直觉思维和语感等现象不是理性或理论,这同样也是不对的。因为缺乏独特见解和艺术感觉的文学和艺术批评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外行的和不着边际的,翻译批评亦然。

3. 再次,关于一项研究的结论和结果,究竟应当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或者说是理论性的、普遍性的,还是实证性的或个别性的,这也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一个基本的思考是事实层面,也就是说,在一般个案的、资料性的或实证性的研究里有一个基本的问题要搞清楚,那就是你的发现是什么。面对一大堆资料或一组研究对象,如果没有任何的发现(实体的或关系的发现),就等于没有研究的结果或结论(当然,在严格的科学研究的意义,一无所获也是一种研究的结果,但必须是严格的科学研究程序或操作下的无所发现)。第二个层面,就是理论的发现,也就是说,你的研究在理论上有无要说的话。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对相关的理论作出评价,或指出它的应用范围和局限。与之相关的问题是,经过一定的研究,对有关理论的应用范围有所拓宽或加深,那也算是一种理论的发现。第三个层面,就是理论的深化或升华。也就是说,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一个批评性研究或鉴赏性研究在理论上意味着什么或有什么样的理论意义,如果这个研究结果和预先设计或设想的一样,即只是证明了原来的理论或理论假设,那最多只是完成了预定的任务,而谈不上有什么理论性发现。相反,如果研究的结果意味着对原有的理论有修正和改进的可能,而且实际上也作出了改进

和修正,甚至能够从一项具体研究中发现或总结出新的理论来,或者说通过说明更多的事物或现象而发现了规律性的、普遍性的东西,那就是理论升华了。迄今为止,在具有实证研究基础的翻译批评型研究中究竟应当如何进行理论的升华,我们正在探索,希望能走出一条路来。

4. 此外,还有一个关于描述性研究和规定性研究的问题,其中涉及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是否需要判断的问题。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我这里做的是描述性研究,不作任何价值判断,只是纯客观的描述。事实上,这里存在着某种误解,甚至是双重的误解。一重是误解了描述性与规定性研究的关系,似乎描述可以不以规定性为前提。质言之,从概念和认识的起点来说,没有规定性就不可能有任何质的分界和概念性认识,因此也不可能有科学的描述(须知科学思维是以清晰的划分为界定和认识基础的)。另一重误解是对于判断的误解,以为“纯客观”的描述不需要价值判断,甚至一般思维中的判断也可以不要。其实,即便是科学的研究也需要人文价值作为前提和基础,而没有判断即质的规定性、量的相关性以及度的确定性的认识,就连描述也不可能。

5. 最后,蔡博士的研究虽然对于所有研究类型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但对于文学翻译批评性研究,特别是一作多译的研究则会有相当的普遍意义。在面对多个译本的时候,研究的结论究竟是不是包含对于各个译本质量的评价,抑或只是说明这些现有译本的总体图景就是互补与多元的关系。在理论上,似乎后一种结论更具有学术性和思想性(但需要作进一步推导和论证,而不是靠引证现成的理论观点),而实际上,对多个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无论是旨在寻找差异或共同点、解释误读或误译,还是旨在验证某种理论,对于这些译本质量的评估和感受都是不可避免的。虽然这两种倾向或做法可以处于不同的层次而和谐共处于一个统一的研究之中,但也可以有不同的倾向或侧重,以便显示出不同的研究结论,或偏于实证的,或偏于理论的。二者的结合,则可能导致更加深刻的理论认识,或更加有洞见的实证性结论。例如,在对不同时期或国度的译本做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在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可以按照一定的主题或问题进行分类或分级评价,这样的研究就有可能导致比较复杂的研究途径或图景的描述,或深化复译或重译的概念,也可能导致进一步的理论升华或理论发现。在目前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中,能做到如此精密的似乎还没有发现,也许可以作为一种新的研究状态而期待于来者了。

总之,希望以上的认识有助于对蔡华这项研究的深入认识和这本专著的阅读推介,同时对一般博士阶段的研究定位和博士论文的写作思路也能有抛砖引玉的作用。相信这本专著将会对我国的典籍英译研究,特别是对陶渊明诗歌的翻译与评论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二、关于陶渊明的诗文和思想

下面谈一下我本人对于陶渊明诗歌及其思想的一些认识,最后再转回到对于陶诗的翻译和批评研究上来。

事实上,我对陶渊明诗歌的热爱缘于对中国思想的研究。作为乌托邦思想的一个典型,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首先引起了我的关注,其中思想的考证和阐发是我的第一步。

1996年3月,我在陕西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做兼职研究,而人文研究所刚刚成立(我也是发起人之一)。在改革开放与文化反思的热潮中,血气方刚的我拟了一本中国诗歌经典研究专著,由于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我把这本专著又命名为《诗国神游:思与诗的对话》。如今找到的这个目录已经不全,只包括前三章内容:

1. 奇迹隐五百,一朝敬神界
[晋]陶渊明《桃花源诗并记》中的乌托邦思想
2. 无人信高洁,谁与表余心?
[唐]骆宾王《在狱咏蝉》中的孤高心态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唐]李白《月下独酌》中的三重人格结构

中间的内容大概已经丢失,甚或当时就没有细拟出来,而最后的两章内容涉及现代的则很是明白,但只是题目,内容尚未写出来。

1.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现代]鲁迅《自嘲》中的文人自画像
2. 五帝三皇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当代]毛泽东《咏史》中的中国历史哲学

这个出书计划事过境迁,虽告流产,但当时的想法却很清晰,而且主张也很明确:

中国是诗的国度,古往今来诗人诗作不计其数,诗词的注本选本如汗牛充栋,但多数囿于字词典故注释,意境欣赏评析和做诗法的介绍,缺乏新的研究角度和思想的挖掘深度。笔者注重思想和文化的比较研究,拟选历代典范诗作数十篇,运用新的交叉学科的方法挖掘其中思想性,或曰以诗为本,诗思对话,参照东西,贯通古今,为中国诗歌研究纳入文化史的研究开一新路,为中国诗歌走向世界开一窗口。(王宏印,1996年,未发稿)

当时编书的体例要点也写出来了。一是题旨要义,旨在点明思想要点,所谓发前人所未发。一是文本注释,包括校勘古注与今译英译,以扩充文本的流传。一是内容分析,在考察思想发挥观点的同时力求理出系统说出原由。最后是思想评述,结合中西思想的比较研究作一番人类文化史的评论。

历来对于陶诗,文人多所推重,但原因不一。喜欢其平淡冲和的诗风者有之,推崇其超然物外事外世外的人品者有之,向往其怡然自得的隐士生活者更有之。但思想性的忽视是传统陶诗鉴赏和分析的缺陷,尤其是其中的乌托邦思想的挖掘不够,或虽然笼统地指出了但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影响了陶诗的深入研究,或停留在崇拜与推崇的常规心理上而难以进展。

大体言之,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是由诗和记一同构成的一个思想系统,“记”略述桃花源为渔人所发现并为渔人和他人所不可复得,其中的景致只是略记,而“诗”则详述了这一乌托邦的来历、世外桃源人的生活以及诗人的深切向往之情。因限于篇幅,不录原文,只概述其大要如下:

1. 以记文开始的情形观之,则桃花源依山傍水,穿洞可得见,诗人与渔人为主线,使其舍舟而入,而内部的景观与人情乃农业文明之气象。虽以洞为幽,以川为明,阴阳相对有神秘感,但实为人间之境而非纯粹虚构所致。况且此中人“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实在与世人无异,而非天外来客或神怪仙灵之类。但以渔人步入良田的细节可知,其中象征的由渔业文明向农业文明的进化历程依稀可见,或可解释为是作者由农业文明向渔业文明的倒推逻辑所使然,这也是一般构思理想社会追根溯源式思维的常态。例如,老子的理想国上推到小国寡民,而陶渊明实际上推得更远,曰:“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见《五柳先生传》)

2. 从记末所记观之,则桃花源中“不足为外人道也。”似有保守内部秘密之企图,以免外人侵扰其安闲生活。而渔人出,告于官府,差人来寻,虽有渔人记号,终不可得,而有高尚之士闻之,欣然前往,反抱病而终,煞有介事一般。其实前者似乎暗示了先民逃离秦乱之因,即便是官府之力当无可以查获,而后者的 高尚之士也难以追寻,似乎只有陶渊明一类隐士,既能游于世外,又能以悟契为目标,方能得之。这里的必要条件,其实是很实在的,没有反观时世的高度和超然世外的旷达,是不足以感悟或思考乌有之邦的,也是理想缺乏的本义或根本原因。

3. 理想自有其历史的根源和原型,也有政治的、社会的原因和因素。将理想境地的出现归因于秦代的暴政,虽有写作上的假托之嫌,但也可理解为是暗示了社会的非理想景况和历史原因的理性探索。“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又强调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事实隔绝,突出了庶民与贤达之间的可能的契合。显

然,经由历史原因之考察达到对社会现实的否定,而其超越尘世历史的论述反映了理想社会的构想;既反映文明类型或高低程度之差距,又有其与外界隔绝与历史隔断的独立性。二者之截取,乃贤达与庶民共同之理想状态之谓也。

4. 理想社会的隐现是一对深刻的矛盾,复统一于诗人内心浮现的历史循环规律。诗曰:“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自秦止汉,约六百年也。而陶氏以五百年记之,大概是要应和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吧。所以,中国的历史循环论实际上隐含了理想的仁君统治模式的深层理念。就这一思想而言,其中国文化历史的特有内涵以及中国传统文人(陶渊明也未能逃其思想局限)的追求方式和思想根源,与西方的乌托邦理想国的来源与表达显然是不同的。

那么,陶渊明的理想国是什么样的呢?简而言之,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礼仪之邦,原始情态

在陶渊明的笔下,隐藏于良田美池、桑竹菽稷之间的礼仪之邦首先表现为对外人的热情。虽然有渴望了解外面世界的热情,但不愿放弃充满稚气的农家的散漫与闲适,对内则“鸡犬互鸣吠”,“荒路暖交通”,人与自然的接近胜于人类自身的亲近。老子的影响显然可见。而重视先辈与神明的祭祀功用,又有更多的儒家思想和周人尚礼的遗韵,加之酒食相待、好言相邀,使得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和礼俗化倾向昭然在目。崇尚古法而无国家,人禽相近而非社会,酒食为足而轻精神,此乃原始先民遗风与儒道思想的混合状态是也。这种原始状态的无分别和无分化状态实际上是前历史的和非历史的生存状态,与成长和成熟无缘,与进步和推想无缘。

二、自然经济,农业文明

往来种作,始于日出,歇于日落,男耕女织,老少乐处,一种自然环境下的自然经济,维系着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蚕桑秋收而无需向官府交纳税收,正是追求《诗经》中的近乎原始的生活状态,又以无政府、无义务的自然人的自然生存、自然消亡和无发展、无进步的社会观为其理论前提。“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既无斤斤于市场之利害,也无戚戚于官场之权谋,到了老庄绝圣弃智的地步。可见,陶氏的社会理想既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否定,也是对一切社会实现的否定,乃至人类文明的否定。形上而言,这是一种具有宗教情怀的超脱与反叛;形下而言,这是一种非适应现世的生存方式和人生态度。但作为适应方式它仍然是自然的、非人为的,甚至是没有问题和问题意识的。

三、生命感悟,天人合一

桃花源中人生产与生活并无严格分别,充满童趣与直率。“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其老少皆宜的快乐生活充满了对于生命的本真状态的体验,而这种体验是属于纯粹感知或感知运动阶段的,自然无为的、无畏和无所谓的,因而也是天人合一的。那种人与动植物一起感受和享受自然生活的方式是清净状态的、纯然的非人文的环境主义的、非技术的和非人类中心的。“草木识时节……四时自成岁。”连人为的时间标志和历法也没有,只是随着一年四季的寒热变化体验自然对人类的恩赐,随着生命节奏中生老病死的内在节律领悟生命本身的冲动和流逝。可见,陶渊明在赋予这种理想生活以诗意的栖居的同时,不知不觉间摘去了或卸下了人类文明的一切花果,徒留下无以更新其款式的衣裳于赤裸裸的欢乐的躯体,或本体的享乐主义。

在西方文明史上,摩尔曾写过《乌托邦》(1516)。而拉丁文的 Utopia 原意为“乌有之乡”。惟其乌有,才能成为追求的理想。欧文曾于 1825 年创立“新和谐”公社,而受傅立叶的影响,美国至今还有数十个公社移民区,作为社会理想的实验基地和理想社会的改良范本。20 世纪和 21 世纪,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在西方出现了非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思潮,然而人类需要理想,不仅出于对未来的憧憬和自身的设计,而且需要一种更加美好而合理的社会来唤醒人类的创造力和天性中的善缘,为自己也为自然寻求新的生机和模型,激发新的动力和路径。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价值趋向和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终极关怀。

西方的乌托邦理想,就思想的来源而言,应当说与亚里士多德的“和谐”社会和柏拉图的“哲学王”的统治主张都无多大矛盾。社会分工和天性有别、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是两个不可分隔的方面,反映了资产阶级和人的意识的觉醒。而在陶氏的小国寡民型的原始社会中,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倾向中,自然人成为完全的自然化了的人,而不是以人的天赋权利为理论基础去争取社会平等机会或权利的改进。更不用说以人的先天平等和意志自由为武器去争取一个自由、平等、进步的理想社会了。

诚然,由于中西哲学思想与社会状况的不同,甚至由于中西文明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诗人和思想家本人处于不同的个人境域中,他们的乌托邦思想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甚至其阶级的阶段的内涵完全不一样。作为诗人而不是思想家的陶渊明,处于魏晋时期动荡、黑暗、落后、封闭的中国封建社会之中,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不可能完全沦落为具有普通人的生活 and 思想,但作为一个中国的士大夫式的思想家,他不可能有希腊哲人的理性、罗马法典的精神和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中的西方人文的思想和理想。他只是为了逃避现实而给自

已设想了一个理想的世外桃源,并不一定要求人类都进入这样一个理想的境地,他甚至没有考察过这种思想的社会合理性,充其量只是合乎人性和人伦,毋宁说他进入了一个与古人思想完全相契合的自然人生之境。沿着这一个逻辑,后人对陶渊明的超越也是异常的艰难。

在这方面,陶渊明与英国“湖畔派”诗人对田园风光的赞赏和向往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不同处在于,陶潜是归农后一面从事耕作一面体验生活的知识分子,而不像英国“湖畔派”诗人那样是在游历中面对乡村风光而沉思或感伤。陶潜兼有士大夫的思想与倾向于劳动者的双重品格,正是他成为后人仿效和推崇的主要原因,也是历代文人“拟陶”、“和陶”但又难以超越陶氏思想的文学史传统的要点所在。例如,唐代诗人王维的《桃源行》和康与之的《昨梦录》,立意和境界皆不能逾越陶氏之意,甚至字句都有些雷同。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式乌托邦缺乏新思想的持续激发的来源,而且说明中国古典诗歌创作智源的日渐匮乏和枯竭。历史自晋至隋唐元明而抵清,期间陶渊明的诗文虽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而桃花源的社会理想却几乎凝固在一片风景上。只有到了康有为和他的《大同书》,由于西方思想的激发和社会改革的强大动力,才摆脱了乱世避祸全身、治世歌舞升平的循环逻辑,找到了一种新的社会理想的太平原型。

近世以来,社会变迁,西学东渐,至明末清初,托故改制,鼓吹变法,追求进步。在这时候,启蒙和改良思想家康有为“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康有为文选》注释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4页)其游历之广、考察之细远非居于乡村一隅以诗酒自娱的陶渊明可比。在思想上,康有为将今文经学中的“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礼运》中的“大同”与“小康”相联系,构思了人类历史由“据乱世”进化为“升平世”和“太平世”的三阶段演进过程,也就是由“小康”到“大同”的实现过程。这种以西方进化论为基础的历史观能直接批判封建专制,有解脱社会疾苦的革新精神,参照人权思想主张社会平等自由的理想社会模式,已大大超越了陶渊明式的小国寡民的原始模式。当然,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也不是没有不合理的因素。在本质上,康有为的思想杂以儒家心性说、今文经学和佛家思想,其朴素的变易观则与西方进化论相契合,形成了本于孔子思想的托古改制而又与西方社会政治理想相混杂的思想体系,构成了近世以来一系列新的中国社会改造的理想蓝图的基础——从孙中山一直到毛泽东。

陶渊明以田园诗名世,但其诗文今存仅130余首(篇),其中诗120余首,文13篇。他一生的创作大约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其分界限大概是《归去来兮辞并序》,标志着他的出仕和归隐。“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些朴实而美妙的诗句描写了诗人悔悟的心情。至于这一

转折的思想基础,除了在魏晋时期的社会动乱中有人心觉醒、崇尚玄学、主张自然的时代精神之外,也有陶渊明自身的原因。他出身没落仕宦家庭,少年家贫苦读立志报国,中年出仕但10年左右即告归隐,其后从38岁就躬耕田垄20余年直到终老。就陶渊明的思想内涵而言,他显然受到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影响,再追述向前,则可以探到老子自然主义哲学之宗的本原。当时的自然,一指自然界的自然,一指自然而然的自然,总之是主张一种合理而闲适的生活,借以反对和冲决名教礼法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和人格自由。陈寅恪先生曾总结陶渊明的思想如下:

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淡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惟其为主自然说者,故非名教说,并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主旧自然说之积极抵触名教也。又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因其如此,既无旧自然说形骸物质之滞累,自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说有所触碍。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惟其造诣所极,殆与千年后之道教采取禅宗学说以改进其教义者,颇有近似之处。然则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而已哉! (《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112页)

陈寅恪先生对陶渊明思想的分析实际上集中在生死观上,可进一步细化到陶氏那首著名的玄学诗《形影神赠答释》的分析上。其序甚短,曰:

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辩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陶渊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陈先生分析要点如下:

《形赠影》,寅恪案,此首渊明非旧自然说之言也……

《影答形》,寅恪案,托为是名教者非旧自然说之言也……

《神释》,寅恪案,此首之意谓形所代表之旧自然说与影所代表之名教说之两非,且互相冲突,不能合一,但己身别有发明之新自然说,实可以皈依,遂托于神之言,两破旧义,独申创新,所以结束二百年学术思想之主流,政治社会之变局,岂仅渊明一人安身立命之所在而已哉! (《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107页)

这一考证自然缜密无间,但若依陈寅恪先生之见解,似乎陶渊明继承的是祖先信奉的道教,而且融合了儒家思想,只是排除了佛家思想的影响。显然,这种自然主义被冠以“新自然主义”的美名而生活化和世俗化了。但根据陶渊明的生平和交往来看,他在归田后,与佛教徒周续之和刘遗民往还频频,一同被称为“浔阳三隐”。另外,他与庐山东林寺名僧惠远也常有交往。所以,说陶渊明的思想表现出佛家的空无思想和人生虚幻的意识,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诗作中就有明显的线索,如“吾生梦幻间,何事继尘羈。”(《饮酒二十首》之八)、“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五首》之四)以及“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二十首》之五)。或许可以说,陶渊明的思想体现了一个以儒入仕、以道避世、以佛出世的思想过程或思想系统。其中对道家自然观的继承和革新、对儒家大同世界的超越和否定以及对佛家涅槃世界的向往,构成了一个包括无君、弃智、返古、免税为核心的理想的生活方式和理想社会。

这一十分复杂的思想,反映在他的诗歌和文章中,可以按照主题划分和分析,共十大类。兹列举如下:

1. 归隐

归隐是陶渊明诗歌的主旋律,但并不意味着他不停地重复这一主题甚至相同的词句。被人千古传诵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现的就是一种归隐的心境,而且创造了一个“东篱”的不朽的诗歌意象和一个菊花的傲霜的绘画体裁。实际上,归于山林,不是一般的退隐,而是一个传统。在中国文化与文人生活中,山水诗和山水画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不可须臾分离。

2. 饮酒

陶渊明以饮酒为题的诗不少,如《饮酒二十首并序》,其中有几首特别出名,如其五、其七,还有《止酒》、《述酒》等与酒有关的诗作。其实,饮酒的目的不在于酒本身,而是像“竹林七贤”那样,借诗酒以抒怀言志,浇心中块垒。自陶渊明始,诗酒精神,结合了归田倾向,演进了盛唐王维的田园诗中,后来与山林寺观相结合,从此成为一种文化类型。到了宋人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政余弄文的官员发展了这一有归隐倾向的文人传统,结合了与民同乐的儒家政治理想,使宋代散文达到了高潮,而以清代遗民画家石涛、八大山人为文人隐逸之绘画艺术的顶峰,遂逐渐衰微。

3. 死生

生命意识的觉醒使得陶诗有了存在主义意义上的生死观,而自然主义的死亡意识和人文关怀的祭祀意识的表露,则使得陶诗弥漫出一种阴沉沉的气息(这种氛围,在《红楼梦》的《芙蓉女儿诔》中仍然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对于弟妹的祭文,特别是那篇《自祭文》,将陶潜的旷达的死亡观推向了高峰。严格说